

特约顾问 季羨林

永樂大鐘

梵字铭文考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张保胜 著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 in
Sanskrit on the
Yongle Bell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

张保胜 著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
in Sanskrit on the Yongle Bell**

Zhang Baoshe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 / 张保胜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301-07951-6

I. 永… II. 张… III. 金文-研究-中国-明代 IV. H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4094 号

特约顾问 季羨林

书 名: 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

著作责任者: 张保胜 著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951-6/H · 12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3.75 印张 彩插 12 45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Foreword

季羨林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迅速发展，佛教梵文文物的发现越来越多。考古研究工作者遇到这类文物却如读天书、茫然不知其义，踏破铁鞋，却不得其解。我们知道梵文是印度的古文，懂得的人不多，加之这类文物的字体与现今所习见的字体不同，故这些东西现在在中国很少人能读通，这对我们研究这类文物应该说是一个障碍。张保胜同志是我的学生，在大学学过五年梵文和巴利文，毕业后又从事多年教学和研究。他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发表过一些论文，如《敦煌沙符考》、《沙符与法颂》、《敦煌陀罗尼》、《河北宣化辽墓出土的悉昙陀罗尼》等。最近又为湖北考古所、北京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等单位解读、诠释了类似文物。说得明确一些点，他是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少有的，如果不是仅有的专家。

《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是张保胜同志近年来所完成的一项大工程。明永乐大钟重 46 吨，内外汉梵佛教经咒铭文 23 万，其中梵字 5000 有余。《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的完成使近 600 年的佛钟铭文第一次得以解读，让读者一睹其奥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永乐大钟上的梵字铭文都属于陀罗尼，即咒语的范畴。凡咒语“但当诵持，勿须强释”，这是密教经典所强调的。那么，对它的研究有没有价值呢？我们说有的。它是古代遗存，属于文物。凡文物就有文物价值。作为文物，哪怕是一片纸，一片瓦也应细心地加以保护和研究。因为它记录着历史，蕴含着文物产生时期的社会、信仰和文化信息，折射着昨天的人类文明。而研究人类的昨天是为了更真切地认识今天，认识昨天和今天是为了更好地预示和规划明天。我们不能没有历史，没有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借鉴，就不能有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至于永乐大钟，它的铸造与永乐皇帝密切相关，对它的解读与诠释有利于明廷

绪 论

Exordium

明永乐大钟是明成祖朱棣皇帝定鼎北京敕命铸造的，距今近 600 年。其间历经沧桑，至清代乾隆朝才悬置于觉生寺（今北京大钟寺）内。大钟通高 5.60 米。口径 3.30 米，重 46 吨。钟体内外尽铸梵梵经咒，总计 23 万之巨，可谓梵钟之最。在近 600 年的历史中，每当佛钟奏鸣，波罗蜜多之妙音悠悠扬扬响彻天宇，广被京城。这钟声给人以启迪，给人以警戒，给人以劝勉，给人以慰藉，也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讲述着她的尊严和荣耀，也讲述着她的辛酸、屈辱和再度辉煌。关于大钟的历史及其妙声之因缘，古钟博物馆前馆长高凯军研究员、副馆长全锦云副研究员和夏明明高级工程师三位先生已予以探索和揭示（见附录）。本书的重点在于对永乐大钟上梵字铭文的解读和诠释。在这里就与梵字铭文有关的问题讲几点看法。

藏地密教的历史背景及其迁流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Spread of the Esoteric Buddhism of Tibet)

大钟的梵字铭文与藏地密教密不可分。若要了解铭文的原委，必先了解藏地密教。密教又称密宗、秘密教、真言教、金刚乘等。据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而得名。传说，大日如来授法金刚萨埵。佛释迦牟尼逝世后八百年，龙树开南山铁塔，亲自从金刚萨埵受法，后传龙智，龙智传金刚智和善无畏。大约于 7 世纪与印度民间流行的原始密教以及印度教的某些信仰相结合而形成印度佛教密宗，以严密的咒术和仪式为其特征。主要经典《大日经》、《苏悉地经》和《金刚顶经》。唐开元（716 年）间善无畏来唐与其弟子一行译出《大日经》；开元八年（720 年）金刚智与其弟子不空传入《金刚顶经》，后由不空译成汉文，从而形成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差不多与此同时印度密教也传入到我国西藏地区，并与西藏土著宗教苯教结合形成具有西藏特征的藏传密教，简称“藏密”。

藏密于 8 世纪由寂护（Śāntirakṣita）、莲花生（Padmasambhava）、莲花戒（Kamalaśīla）传入。12 世纪时轮密教（Kālacakra，也称时轮密宗）传入西藏，15 世纪中叶以后与西藏最后兴起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格鲁派——黄教相融合。时轮宗的标志是时轮金刚曼荼罗，或十相自在图。它往往以七个蓝扎字（音节）堆写而成时轮金刚咒。

如北海公园内白塔上的徽形图案即是。

时轮密宗对西藏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根据沃伦斯（Vesna A Wallance）的《内时轮密经》（*The Inner Kalacakratantra*），时论密教约11世纪兴起于南印度。根据藏文资料，10世纪下半叶，有一位名叫席路帕（Cilupā）的奥里萨（Orissa）大师在宝城（Ratnagirī）一座寺院里读到了《时轮密经》（*Kālacakratantra*），而后到了香巴拉（Śambhala）接受了口传教义。之后，他回到了南印度，并接受了三位弟子。其中一位名贫道（Pindo），来自于孟加拉。贫道的一位弟子尊称大时轮足（*Kālacakrapāda*）。他也教授了一些弟子，其中最有名的被尊称为小时轮足（*kālacakrapāda*）。他在那烂陀建立了时轮寺（*Kālacakra temple*）。据沃伦斯的考证，一些被收入《甘珠尔》的精通时轮密经大师，如达里羯（*Dārika*）、无上护（*Anupamarakṣita*）和妙子（*Sādhuputra*）的著作形成于11世纪初。所以确定时轮密宗形成于11世纪初是言之成理的。但它的酝酿时间大约在八九世纪，或更早。它与印度民间流行的崇尚巫术的密教（顺世派 *Lokāyata*）有密切关系。关于时轮密宗的传布地域，可以说滥觞于南印，传布于北印。真正受其影响的地区却限定在孟加拉、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克什米尔一带。其中还应包括尼泊尔。在我国发现的有关时轮密教的文字遗物主要是蓝札体梵文。而蓝札作为一种语言在古代曾一度是尼泊尔的国语。乌仗那国（*Uddiyāna*，今克什米尔北部）民间盛行巫术，它是著名的密宗大师的故乡。据季羨林先生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法）罗伯尔·萨野考证，乌仗那国和香巴拉（*Śambhala*）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整个山区。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肯定曾为晚期佛教新观念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一块特别有用的地盘。它促进了这些新观念的发展。

熟悉藏族历史的学者都知道，9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下半叶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藏区佛教处于窒息的状态。在这一时期不可能有任何佛教派别流入。而11世纪是时轮密宗初兴阶段，在这一时期，即便有个别教徒入藏也没有形成气候。到了12世纪，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入侵迫，使印度北部和克什米尔的佛教高僧和艺术家纷纷逃到尼泊尔和西藏避难。时轮宗此时也就自然流入到西藏。一些藏人跟随难僧学佛，也学到了时轮宗。这表明时轮宗传入西藏当为12世纪晚期。13世纪初叶由于土耳其人（*Turkish*）入侵比哈尔和孟加拉的，时轮宗在印度的传布即告终止，但它的传统并没有死亡。它可能一直延续到15世纪。明天顺六年（1462年），一位名叫林宝（*Vanaratna*）的班智达（*paṇḍita*，精通梵文的高僧学者）是最后一位经尼泊尔进入西藏时轮密宗大师。他在西藏教授并翻译了几部梵文时轮密经。（这表明时轮密宗的学说和实践在印度的传播差不多持续了5个世纪。）

时轮宗传入西藏后与原佛教结合，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蒙古地区和中国内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到今天。它不仅融于中国民俗，而且深深地影响到三代皇室。尤其是元王朝对于藏传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发挥了独特作用。

元代

元王朝与西藏统治阶层有着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始于13世纪前半叶。1240年，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自河西走廊发兵征服了西藏，西藏佛教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受西藏诸派之托和阔端之请先遣八思巴（Phags-pa, 1239—1280）和恰那多吉两个幼侄于1245年抵阔端驻地——凉州（今甘肃武威）。萨迦班智达在作了多方准备之后，于1246年也赶到凉州，并与阔端达成西藏归附元帝国的协议。元王朝便借助西藏的佛教势力对其实行了有效统治。萨迦班智达死后，八思巴继承了萨迦班智达的衣钵，成了萨迦派新教主，掌握了西藏佛教的统领权。蒙哥在位时，释道辩争，八思巴获胜，愈加受到崇敬。1253年，八思巴应邀与忽必烈（Khubilai Khan）相会于六盘山，并跟随其征战，是年为忽必烈及其王妃举行了喜金刚灌顶，并被拜为上师。

之后，八思巴随忽必烈至汉地。1257年，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八思巴到五台巡礼。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是文殊菩萨的说法道场，深受西藏佛教僧众的景仰。唐时吐蕃就曾遣使向唐索五台山图。西藏第一座正规寺院桑耶寺兴建之前，吐蕃又遣巴·色朗等使者到五台山朝拜。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在凉州时就很向往五台山，但没能如愿前往。八思巴实现了前辈的夙愿，在五台山用密宗的观点作诗，赞颂文殊菩萨。八思巴对五台山的朝觐和赞颂在西藏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元明清三代藏地僧侣竞相朝拜五台之风，许多西藏比丘成了五台山的长住僧。一位与八思巴同时代的藏族高僧胆巴（1230—1303）受忽必烈之命做了五台山寿宁寺的主持。八思巴的弟子、元朝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圆寂于五台山。由于皇家的支持，五台山的香火更加旺盛，以至元明清三朝皇室在五台竞修佛寺，皇后、大臣前往礼佛也趋之若鹜。五台山成了满、汉、蒙、藏宗教文化的枢纽，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八思巴大喇嘛被封为国师，授以金印，总领全国释教和西藏政教事务，并应命主持修建西藏黄金塔，为此萨迦受赠大量财宝。八思巴从尼婆罗国（今尼泊尔）招募工匠。尼婆罗国王命皇子阿尼哥（Anigo，建筑、雕刻大师）率80名艺术匠人入藏。1268年八思巴将阿尼哥从西藏带入大都（今北京）。1269年忽必烈下诏，颁行八思巴奉旨创制的蒙古新字母（后习称“八思巴字”）以代替畏兀字（回鹘文）拼写蒙古语。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在定都大都前夕，将八思巴大喇嘛由国师晋升为“帝师”。1270年12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见《元史·世祖记》）。1275年4月，元成宗命八思巴的弟子胆巴为大护国仁王寺主持。1280年，帝师八思巴逝世，于大护国仁王寺“建大宰堵波，奉葬真身舍利，庄饰无俦”。

以西藏佛教大喇嘛为帝师的不仅是元世祖忽必烈，实际上，元王朝的八位皇帝，每一位都有来自西藏佛教的帝师，且多为萨迦派高僧。这些帝师不仅是元帝宗教上的精神导师，而且对藏蒙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和西藏佛教的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护国仁王寺开始兴建的第二年,即1271年在大都又开始兴建另一座大建筑——妙应寺白塔(俗称“白塔寺”)。阿尼哥是这项工程的设计和主办者。阿尼哥不仅是建筑工程师,其雕像也有非凡的造诣。他的雕像风格俗称“西天梵相”。在他死后,经他的儿子以及他弟子的不断努力,这一风格经由尼泊尔、西藏传入中国内地。这种风格在长途流转过程中自然会融进一些中国因素。故这一风格应被称为“中印风格”或“元代风格”。阿尼哥在绘画和铸造艺术方面造诣也深,故深得忽必烈的赏识,因而受命为人匠总管、光禄大夫,大司徒领作院事等。1306年逝于大都,灭度后受赠太师、凉国公等妙号。

元廷崇佛,至今还留有一些元代的佛教建筑。如坐落在北京东北60公里的八达岭附近的居庸关云台(原为“居庸关过街塔”,明代易名“云台”)。这座建筑落成于元顺帝时代的至正五年(1345年)。其顶部原建有三座窣堵波(stūpa,佛塔)。这座建筑并非民间所为,而是元朝皇帝策划督办的。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西藏的两位大喇嘛。这是一座有特殊宗教性质的建筑。它浸染着浓重的藏传佛教的色彩。在云台拱形门的券墙上不仅雕有四天王像和象征佛教意义的花卉等图案,还有六种字体的陀罗尼铭文:蓝札体梵文(Laṅjanā)、八思巴文(Phags-pa scripts)、回鹘文(Uigur scripts)、藏文(Tibetan)、西夏文(Xi-xia scripts)和汉文陀罗尼。用这六种文字所雕刻的是两个相同的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和《如来心陀罗尼》。除了居庸关过街塔之外,在南口、南城彰义门和卢沟桥畔也都曾建有过街塔。这些塔的原有形制均具有萨迦派的建筑风格。从这些元代遗存中可以看出元王朝以藏传佛教怀柔各民族的良苦用心。

斗转星移,1341年元顺帝在朱元璋大军的攻击下弃城北逃,从而结束了元帝国在中华大地的统治。而得到元廷扶持,在西藏占统治地位的萨迦派也江河日下今不如夕了。15世纪初叶,一个新兴教派犹如滔滔洪流涤荡着旧教累年积淀的萎靡颓败出现在雪域高原,这就是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该派因信众戴桃形黄帽以示严守戒律,故称“黄帽派”,俗称“黄教”。

明代

明王朝取代了元帝国,但它不舍前朝的宗教传统,仍然与西藏佛教,主要与宗喀巴的黄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佛教来强化它对西藏的统辖权。宗喀巴为了纠正西藏佛教存在已久的戒律松弛等颓败之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的改革得到了明廷册封的阐化王帕主·札巴坚赞及其属下贵族的大力支持下。永乐七年(1409年)初,在拉萨发起的一次大型祈愿法会,得到各教派僧众的热烈响应,有一万多人参加了法会。这次法会奠定了他在西藏佛教界的领袖地位。之后在拉萨东北的汪古日山兴建了甘丹寺,格鲁派宣告正式成立。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朱棣遣使拉萨迎请宗喀巴进京。时值黄教初创,地位未稳,正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宗喀巴教务繁忙不得脱身,于是便遣其弟子释迦也失进京

(今北京)朝贡。永乐皇帝封其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九年(1434年)明宣宗封其为“大慈法王”(藏语为“绛钦却杰”),命其在中原传教。释迦也失返藏后,分别于永乐十四年(1439年)和十六年(1441年)在拉萨城郊修建了哲蚌和色拉两座寺院。这两座寺院和甘丹寺合称格鲁“三大寺”。三大寺的建成为格鲁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据称内地和蒙古的一些地方的黄教是绛钦却杰传授的,又称山西五台山有五座黄教寺院是由他修建的。正是他开创了黄教与明廷的直接联系。之后,永乐帝还曾册封噶玛噶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大宝法王”。明万历(1576年)年间,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年)应臣服于明朝的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俺答汗之邀,到其驻牧的青海,与之会盟之后,于1578年随俺答汗奔赴内蒙古,途中在宗喀巴的出生地(今青海湟中县)修建了一座寺院,后经扩充终成著名的塔尔寺。路经甘州时,接受俺答汗的建议,索南嘉措给当时明朝宰相张居正写了一封诚愿效忠王朝的信,并请求允他定期朝贡。明廷接受了他的请求。按照“国师以下者不得进贡”的规定,允他进贡,是把他当作国师看待的。俺答汗于1583年逝世。索南嘉措于1586年应俺答汗的子孙之邀到蒙地土默特参加俺答汗的葬礼。1587年,明廷遣使前往土默特封索南嘉措为“朵尔只唱”(即“执金刚”),并邀请他来北京。他接受了邀请,但不幸的是未到京城便于1588年病逝于途中。

汉藏蒙的频繁交往通好必然会带来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些影响也反映在历史的遗存中。这里只举例作一简略说明。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北有一座寺院名“真觉寺”,原名“正觉寺”,据称为始建于元的大护国仁王寺,明成化年间改建,名“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关于真觉寺的成因和时间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永乐年间一位名叫室利沙(*Śrīśarīputra*)的印度僧人来华,受到明成祖的接见。他携来塔的图形,于成化年间建成五塔寺内的金刚宝座塔。一说,金刚宝座塔建成于1473年,室利沙逝世在成塔的50年前。故该塔与室利沙搭不上边。上述几种说法,孰是孰非,迄无断论。但从塔的风格和塔基的蓝札铭文得知,该寺与藏密有密切关系。

另一处是居庸关过街塔,这本是元代建筑,明朝并没有将这座前朝遗物毁弃,而是将其保存下来,更名为“居庸关云台”。而“云台”顶部的三座佛塔不知什么原因,什么年代被换成了具有汉族特征的三座木结构的亭子。为了统合民心,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重修了这三座木亭子。其中供奉着三尊佛像:密宗主尊大日如来(*Vairocana*)、文殊菩萨(*Mañjuśrī*)和普贤菩萨(*Samantabhadra*,又名金刚萨埵 *Vajrasattva* 或金刚手 *Vajrapāṇi*)。重修这三座木亭的资金是捐赠的。而捐赠者主要是明朝的文武官员和太监。除此之外,还有平民百姓。(参见村田治郎主编的《居庸关》第二卷: *History of Outline of Chu-Yung-Kuan* (《居庸关历史概览》))现在,虽然这三座木亭已荡然无存,但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墙上的浮雕以及六种文字的陀罗尼还依然存在。可惜的是那些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景德镇官窑始于建文帝四年（1402年）。所烧瓷器不仅有生活用瓷，还有一部分是专为皇室举行祭祀大典的祭器。有些祭器浸染着浓重的西藏密教的神秘色彩。笔者曾目睹过两件明官窑的祭器照片。其中一件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兰花青瓷蓝毘文罐，另一件是景德镇瓷器博物馆收藏的明官窑烧制的梵字兰花瓷匙。两件瓷器上均绘有梵字陀罗尼，所不同的是前者用以书写陀罗尼的是蓝札体梵文字，后者则是类蓝札体梵文字。近来获悉湖北襄樊有一座明代大钟，上面也铸造了许多蓝札体梵字经咒；湖北张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法被图，其上绘有净土宗的众圣来迎图、藏密的五智如来佛塔、蓝札体梵字佛顶尊胜陀罗尼和汉藏经咒；再就是近来梁庄王墓发掘的佛教文物，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质地的金贵，造型的精美是世所罕见的。譬如大黑天舞姿神像、蓝札体梵字咒、长寿佛像、金翅鸟像、曼荼罗佛珠饰件、十相自在图等均为纯金打造，随经数百年浸染剥蚀，今天仍然光亮如新。可见，明王朝崇尚藏传密宗之深。

清代

到了明末，在关外的清政权为了密切与西藏地方的关系，1639年，派员到西藏会见藏地各派首要，请他们派高僧到内地传教。1642年，西藏各派系派员到了盛京（今沈阳），向清太宗皇太极递交了各派领袖人物的信函，这些领袖人物有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进驻青海的一支蒙古族统治者固始汗等。他们都向清朝皇帝表示良好的祝愿，并争取清廷的支持。西藏使者到达时，太宗皇太极亲自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设宴盛情招待。除此之外，皇太极还分别给西藏各派领袖人物写了回信，向他们表达了清廷对各派一视同仁的胸襟和意向。同年，固始汗挥军入藏消灭了敌对势力，从而使他成了包括青海、康区和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的汗王。他在拉萨建立了他自己的地方政府，并在当雄驻扎了蒙古八旗兵。固始汗的这一举措开了清朝驻军西藏的先河。这支蒙古派系在西藏的统治之后，驻扎在当雄的这支军队由清朝的驻藏大臣指挥，当雄也成为清朝驻藏大臣的直接辖区。1645年，固始汗为了检抑达赖的权势把日喀则地区划归四世班禅管辖。后来的清政府也沿袭了这一政策，使这两个平行活佛系列相互制约，不使一方权力过分集中，以影响清政府对西藏的统辖。1652年五世达赖应入关不久的顺治帝之请到达北京。清政府给他以优厚的礼遇，并为他在北京修建了黄寺作为五世达赖的行宫。五世达赖离京返藏前，顺治帝以丰厚的礼品金银相赠。1653年，顺治帝遣礼部尚书和利藩院侍郎携金册金印赶到代葛（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凉城县内），追上五世达赖，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册封金印一直保留到至今。在册封五世达赖的同时，清政府也派使臣前往西藏封固始汗“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金册上还有“作朕屏辅，辑乃封圻”，意为做帝王护边助手，让你的封地和睦安定。这意味固始汗被授予了统辖西藏的行政大权。而达赖只被封为西藏佛教的领袖。1682年，五世达赖去世，由五世达赖生前授命的权力继承人桑

结嘉措秘不发丧，盗用五世达赖名义掌管黄教事务达15年之久，并要求清廷封自己为藏王。直到1697年在清廷的责问下，才宣布五世达赖早已去世，转世“灵童”也已找到。同年10月把15岁的“灵童”迎至布达拉宫坐床，是为六世达赖。但六世达赖不安于深锁宫中的黄教领袖地位，一心向往浪漫的爱情生活。在追求爱情的旅途中终于成了风流倜傥的诗人，写了不少热情奔放的情诗。1705年由于多种原因，康熙帝废黜了六世达赖。1721年，清廷派兵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进藏，并驱逐了扰藏的准噶尔军队，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清政府总结了治藏的经验，于1751年，颁诏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府。从此西藏开始了政教合一的历史。

这一段历史在内地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崇尚西藏佛教的文物遗迹。如河北承德的仿西藏桑耶寺的普宁寺、普乐寺，被誉为“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和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寺是为了班禅六世来承德庆祝乾隆六十大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6年）兴建的。在北京还有雍和宫。雍和宫本是皇四子胤禛的府第，乾隆九年（1744年）改为西藏佛教的寺院，俗称“喇嘛庙”。这座寺院充满了西藏密宗的神秘气氛。清乾隆年间对坐落在北京的明代寺院——真觉寺（五塔寺）进行了扩充和修缮。呼和浩特市也有清代兴建的五塔寺。在这些建筑中多有蓝札体梵咒铭文（陀罗尼）。特别是两个五塔寺的金刚宝座上布满了蓝札体梵文陀罗尼铭文。雍和宫至今每遇修缮，此类陀罗尼都会被绘饰一新。在清东陵地宫也发现有不少蓝札体梵文陀罗尼。前不久，在辽宁发现了一座清廷近卫将领的墓穴，出土了一方陀罗尼织锦被，看上去十分豪华。它象征着墓主显赫地位。这些墓葬都与清廷有密切关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的宗教政策及信仰。

以上所述是汉、藏、蒙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的梗概，从这些简要概括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感到西藏佛教的影响和活力。从中还可以体悟到几代君王及其王室对于密教金刚、明妃的崇信和虔敬。他们礼佛、建寺、铸钟、铭咒，其良苦用心在于拢合各族，抚慰民心，安定社稷，永固江山。

梵字铭文的语言特点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anskrit Inscription）

大钟的梵字铭文的语言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文学作品那么多华美的辞藻，也没有诸多修饰语。名词大多是佛、菩萨、天王、明王等佛教神祇的名号，语法形式多为阴性呼格。何以出现这种阴性为主导的现象，下文《六字真言》和《曼荼罗》两节有较详细的探讨，兹不赘。动词多为现在时，主动语态，命令语气，单数，第2人称。之所以大量出现名词呼格和动词命令式，与宗教对神的取悦和祈请无不密切相关。动词命令式的语尾变化往往不合规范。譬如动词现在时分九类，有两套语尾变化形式，其中一、四、六类应用第一套，其

余用第二套。属于第一套语尾变化的动词现在时，命令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二人称与语干同，属于第二套变化的，语干尾音是辅音的，语尾是 **dhi**，是元音的，是 **hi**。然而大钟铭文动词现在时，命令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二人称，基本不分类别，统统采用第一套语干形式，譬如，第一类动词根 $\sqrt{\text{bhū}}$ （是，成为），语干形式为 **bhava**；而第七类动词 $\sqrt{\text{bhid}}$ 应采用第二套变化，其命令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二人称应为 **bhindhi** 或 **bhinddhi**，然而却采用第一套语干形式 **bhinda**。这样的例子不少，下面再举几例（cl=class 类）

动词根		不规则形式	规则形式	其它不规则形式
$\sqrt{\text{chid}}$ (cl. 7)	——	chinda	chindhi	(斩断)
$\sqrt{\text{bhī}}$ (cl. 3)	——	bhaya	bibhīhi	(害怕)
$\sqrt{\text{khad}}$ (cl. 10)	——	khada	khadaya	(杀，伤害)
$\sqrt{\text{han}}$ (cl. 2)	——	hana	jahi	handhi (杀)
$\sqrt{\text{dṛ}}$ (cl. 9, 2)	——	dara	dṛināhi	darhi (劈开)

蓝札梵字的书写是藏僧的“专利”，汉人不通此道。但精通书写的藏人未必精通梵文，而梵文依照习俗口耳相传，故对读音历来十分重视，印度的班智达对读音，如长、短、轻、浊、送气不送气等非常敏感。这是中国人所无法比拟的。故在梵文的书写上常常发生错误，特别是密咒，只重读音不究其义，这就更导致了拼写错误的发生。故在永乐大钟梵字铭文中出现不少错误。譬如：

正确	其义	误写
jalo hrini	(骑水牛者)	jaloharaṇi
sarva-grahān	(一切执着)	sarva-grahāna
samyaksambuddhāya	(正遍知)	samyaksambuddhāsyā
vajra-sattva	(金刚萨埵)	vajra-satva
nīla-ambara-dhara	(着青衣者)	nila-ambara-dhara
diśāṃ	(诸方的)	diśān
karoṭa-vīrye	(因骷髅项链而现英气者)	karoṭa-virye

等等。像这样的拼写错误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这些错误有些很容易辨识，有些则给诠释造成很大困难。

之外，还有其他少量带有方言的特征，如 **dhamma**——巴利文特征，梵文：**dharma**；**karmma**——尼泊尔梵文特征，规范梵文：**karma**。其它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我想这就够了。

蓝札铭文

(the Inscription in Rāñjaṇā on the Yongle Big Bell)

永乐大钟上的蓝紫铭文含有三方面内容：种子字、陀罗尼和曼荼罗。

种子字 (bija) 即象征佛菩萨和佛教经义的文字符号，是经义的高度浓缩。它含藏诸多信息。因其如种子能派生多义，而故名。如 **hūṃ trāṃ hrīḥ aḥ** 分别象征不动佛、宝生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而 **a** 则是整个波罗蜜多经的浓缩，象征大乘佛教中观派和密宗的性空论。我曾访问过日本高野山的密宗圣地。这是由入唐高僧空海建立的，是现今日本著名的圣城。小城坐落于森林茂密的山顶，约 1 公里长的街道横亘其中，沿街寺院却鳞次栉比，据说有 53 座之多。沿街两侧和奥之院的山林陵园中，到处可见有五个悉昙梵字铭文的小窄堵坡（小石柱，有的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或称五轮塔，寺院内的布幢上也多是这五个种子字：**a va ra ha kha** 或 **kha ha ra va a**。这五个梵字所象征的是密宗的最基本的哲学思想：“五大”说，即世界由地水火风空五种粗大元素构成的学说，但也融合了“诸行无常”的佛教思想。

陀罗尼 (dhāraṇī) 又名陀罗尼，或陀邻尼等，都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持”。这个阴性梵文名词 **dhāraṇī** 来源于动词根 $\sqrt{dhṛ}$ ，它有“保持”、“护持”、“坚持”等义。从这个词根派生出一个形容词 **dhāraṇa**，意为“保持着的”、“护持着的”或“坚持着的”，那么，保持（或护持、坚持）的对象是什么呢？那就要看保持者的欲意了。大乘佛教欲将其一切，如佛陀的教诲（法），法的精义，于禅定所发的秘密语（咒）以及坐禅所证悟的诸法实相（空）等都要含概于护持之中。于是便采用了从 **dhāraṇa** 派生的阴性名词 **dhāraṇī**（陀罗尼）。换言之，“陀罗尼”表示大乘佛教所倡导的一切都要护持不忘。因此，“陀罗尼”也称“总持”。根据它所持的内容又派生四个术语：“法陀罗尼”，对于佛法听闻之后保持不忘；“义陀罗尼”，对于诸法所表达的意境总持不忘；“咒陀罗尼”，对于秘密神咒总持不失；“忍陀罗尼”，对于诸法实相的坚守不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咒陀罗尼在民间流行越来越普遍，所以，“陀罗尼”就成了“咒陀罗尼”的代称，其简称“咒”或“真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永乐大钟蓝札字陀罗尼大多属于“咒陀罗尼”。其它汉文佛经则属于“法陀罗尼”。大钟上共有咒语 145 道、曼荼罗 7 幅、呪牌 4 帧、种子字 77 个。

曼荼罗

“曼荼罗”是梵文 **maṇḍala** 的音译，古来译名较多，如“曼陀罗”、“漫怛罗”、“满荼罗”、“曼孛罗”、“蔓陀罗”等。印度修密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在地上划出一个或圆、或方、或鸟等图形，或修建上述形状的土坛，或于上画佛、菩萨像，事毕废除。这样一个修法场地称曼荼罗。佛家常译为“坛场”或“道场”。这种以大日如来或某佛、菩萨等

为中心、分层环绕诸尊的修法场地又被称为轮圆具足。在我国和日本则代之以诸尊纸帛图。日本东密有金刚界曼荼罗和胎藏界曼荼罗两部曼荼罗（两界曼荼罗）。在台密，则以苏悉地法用杂曼荼罗。又两部曼荼罗之图样因经和仪轨的不同而不同，现在流行之图示曼荼罗，称为现图曼荼罗。据称“曼荼罗”有四种：“大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荼罗”；“羯磨曼荼罗”。所谓“大曼荼罗”，指绘有诸尊具足相好容貌的修法场地或图画，即总集诸尊之坛场，或曰尊形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示现诸尊本誓的器械和印契的坛场和图画；“法曼荼罗”，指绘有诸尊种子字、或真言或经文义理文字的绘画；“羯磨曼荼罗”，象征诸尊的各种威仪事业的立体造像。这四种曼荼罗，又各含三种曼荼罗：（1）都会（都门、普门）曼荼罗，诸尊俱足聚集一处，如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金刚界曼荼罗和胎藏界曼荼罗。（2）部会曼荼罗，部分诸尊聚集一处，如佛部的佛顶曼荼罗，莲华部的十一面观音曼荼罗等。（3）别尊（一门）曼荼罗，以一尊为中心的曼荼罗，如释迦曼荼罗、如意轮曼荼罗等。依据上述分类，永乐大钟上的“曼荼罗”应属于“法曼荼罗”。

其实，整个永乐大钟就是一尊都会曼荼罗——密宗所想象的以本尊毗卢遮那佛所化现的宇宙图——须弥山（**Sumeru**）。须弥山又作苏迷卢山、须弥卢山、须弥留山、弥楼山。意译作妙高山、好光山、好高山、善高山、善积山、妙光山等。其原为印度神话的山名，佛教宇宙观沿用之，谓耸立于世界中央之高山。以此山为中心，周围有八山、八海和四大部洲环绕，而形成一个世界（须弥世界）。关于它的神话传说，印度教和佛教各家有所差异。据密宗所传，须弥山的基础是地、水、火、风、空等“五大”（**pañca-bhūtāni**）（五种粗大物质）。其中前四大形如巨轮，安于虚空。风轮最下，其上为水轮，依次为火轮、风轮。彼此之间犹如四个巨盆一个套一个，四盆口沿水平如一。风令其凝聚不散，又不断鼓动使其形成高山低谷。须弥山就耸立其上。山高八万四千由旬（**yojana**），约 56 万公里（《维摩诘经》说 160 万公里）。大钟上诸尊的种子字象征该尊所在位置。毗卢遮那佛位于顶端的中央，其周围有阿閼、宝生、不空成就、无量寿等佛及其明妃，还有诸菩萨、天王、明王、天龙八部，八方护法、夜叉、罗刹等一切恒沙神祇。他们护持着栖息于南瞻部洲的有情众生。永乐大钟这座“须弥山”像一根巨大的擎天柱支撑着华夏天空，令华盖下的子民安居乐业，保永乐基业万年太平！

八叶莲种子曼荼罗

（A Seed Maṇḍala of the Eight-Petalled Lotus）

大钟悬挂结构上 U 形环正表面有一幅曼荼罗（见图版 1），据其形状和种子字定名为“八叶莲种子曼荼罗”。在八叶莲花图的中心也有一个圆，圆中绘有一个倒写的 **Oṃ** 字。在八片莲瓣上，从上顺时针，分别绘有 **hūṃ**、**lāṃ**、**trāṃ**、**māṃ**、**hrīḥ**、**pāṃ**、**aḥ**、**tāṃ**。

在八瓣莲花图下方有“归敬颂”：**Namo ratnatrayāya**（致礼三宝），最后一个 **na**，是下文 **namo**（南无）的第一个音节。像这样一幅种子曼荼罗在现有的佛教大藏经中是没有图例的。据佛经所述，曼荼罗可分为两种：现图曼荼罗和阿闍梨曼荼罗。前者是“善无畏三藏祈请虚空炳现之坛形”，即现在流布于世间的曼荼罗。“阿闍梨所传曼荼罗为大日经及仪轨所说，不载之于图画。由一阿闍梨传其作法（修行密法）及义理。二者相违之点不少”（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曼荼罗”条）。说明第二种曼荼罗不载于图画，而是专为密教徒修行实践用的。为了弄清楚“八叶莲种子曼荼罗”确切归属，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幅曼荼罗上的种子符号究竟象征什么。

中央莲台的 **om**——大日如来（**Vairocana**）。

从上顺时针：

hūṃ ——东方阿閼佛，	lāṃ ——佛眼佛母（ Locanā ）
trāṃ ——南方宝生佛，	māṃ ——莽忙计佛母（ Māmakī ）
hrīḥ ——西方阿弥陀佛，	pāṃ ——白衣佛母（ Paṇḍarāsin ）
aḥ ——北方不空成就佛，	tāṃ ——救度佛母（ Tārā ）

我查看了现图和所有能看到的曼荼罗无一能与之吻合。后与佛经对勘，终于在宋施护译《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大教王經》卷一发现了类似的诸尊及其配置：

大毘盧遮那金剛如來，阿閼金剛如來，寶生金剛如來，無量壽金剛如來，不空成就金剛如來。如是等一切如來，譬如胡麻，遍滿虛空而無間隙。是諸如來，於虛空中一一出現。即時出現佛眼菩薩，摩摩枳菩薩，白衣菩薩，多羅菩薩。

关于他们的配置，据该经《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甚深祕密中祕密諸佛大集會安住一切如來三摩地大曼拏羅》分第一的描述：

阿閼金剛如來（**Akṣobhya**）于东方坐，是名金剛部主。

寶生金剛如來（**Ratnasambhava**）于南方坐，是名寶部主。

無量壽金剛如來（**Amitāyus**）于西方坐，是名蓮華部主。

不空成就金剛如來（**Amokha**）于北方坐，是三昧部主。

主尊毗卢遮那金剛如來（**Vairocana**）于中央坐，是佛部主。

接下来叙述了四明妃，即四菩萨的名号和位置：

上首明妃，住女人色相，于東南隅坐，指佛眼菩薩（**Buddha-locanā**，种子字：**lāṃ**）。

上首明妃，住女人色相，于西南隅坐，指摩摩枳菩薩（**Māmakī**，种子字：**māṃ**）；

上首明妃，住女人色相，于西北隅坐，指白衣菩薩（**Paṇḍarāsin**，种子字：**pāṃ**）；

上首明妃，住女人色相，于东北隅坐，指救度佛母（**Samayatārā**，种子字：**tāṃ**）

再下来是居于东南西北门的四明王：金剛大忿怒焰鬘得迦明王，金剛大忿怒鉢囉研得

迦明王，金剛大忿怒鉢訥鬘得迦明王，金剛大忿怒尾觀難得迦明王。虽然在其外层省略了余尊的配置，但从前文所述“如是等一切如來，譬如胡麻，遍滿虛空而無間隙。是諸如來，於虛空中一一出現”。可知，此曼荼罗是一切诸尊的大集会，故据前述曼荼罗的分类可归于大曼荼罗。根据该经的定名为“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甚深祕密中祕密諸佛大集會安住一切如來三摩地大曼拏羅”，简称“一切如來三摩地大曼拏羅”。永乐大钟上的“八叶莲种子曼荼罗”诸尊与该经所述曼荼罗四明王之前的配置完全相同，但前者为象征诸尊的种子字，后者为诸尊圣像。依据分类，可称“一切如來三摩地都会曼荼罗”。它没有象征四明王和余尊的种子字，只是“一切如來三摩地都会曼荼罗”的一种省略形式。“三摩地”是 *samādhi* 的音译，又译“三昧”。意思是禅定，也指禅定中的最高境界。印度教和佛教又称“瑜伽”。“一切如來三摩地都会曼荼罗”的意思是行者在禅定中所观想的一切如来咸集一处的画面。

瑜伽 (*yoga*) 是印度一切教派所继承的修行方法。其法随教派的不同而稍有差异，但其内涵是相通的，都是在禅定中进入主观与所观想的客体相应一如的冥想境界。这种相应一如的状态也称“瑜伽”或“三昧”或“三摩地”。“瑜伽”的梵文本义就是相应、合一、融合等。在各教派间所不同的是被观想、被相应的对象。如在数论派的哲学中，被观想，被相应的对象自性 (*prakṛiti*，原初物质)，就是说主观之“自我”与物质相应，没于物质，从而实现无我也就无苦的理想归宿。印度教令自我与毗湿奴 (*Viṣṇu*)、湿婆 (*Śiva*) 等大神相应，从而突显“汝即彼” (*tattvamasi*)、人皆平等的宗教主张。佛教密宗令主观与所观想的佛菩萨等相应，从而感悟人皆有佛性之真谛。而原始瑜伽是妇女专修的功法——巫术，旨在激发体内阴性的活力，使之与本有的阳性相应，使二者和谐一致，以提高自身并促进农作物的繁殖能力。这一点在密教留有深深的印记。

请注意曼荼罗中女性诸尊的配置，类似配置还有金刚界和胎藏界曼荼罗。这些女性诸尊在宋代称菩萨，明代则称为“佛母”或“明妃”。为了弄清女性佛在密宗的意义，我们先看一看密宗诸经的分类。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修习密法分四类：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无上瑜伽部是最高的。而无上瑜伽部所包含的所有经典都属于“瑜伽女”

(*Yoginī*，女性瑜伽行者) 的 (注意到这一点对于了解和研究密教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无上瑜伽又分三个类别：大瑜伽 (*Mahāyoga*，《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应归于此类)，阿耨多罗瑜伽 (*Anuttarayoga*，狭义上的无上瑜伽)，阿提瑜伽 (*Atiyoga*，致极瑜伽，《时轮经》应属于此类)。而阿耨多罗瑜伽体系则包括《如意轮总持经》、《金刚怖畏经》、《大悲空智金刚王经》、《佛钵经》、《大幻经》、《讠瑟吒夜摩利经》、《四修女合十经》、《大密印顶严经》、《瑜伽女行业经》(*Yoginīsaṃcaryā*)、《荼加拿婆经》和关于陀罗尼的《中间静虑经》等。下面让我们举例述其概要。

据《如意轮总持经》所述，行者 (*Yogin*) 按照如下仪轨来冥想如来 (毗卢遮那佛)。